

中国古代

诗词曲名篇导读

于兴菊·种剑德·王菊·邢鹏飞○编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中国古代诗词曲名篇导读

于兴菊 种剑璠 王 菊 邢鹏飞 编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中国 古代

诗词曲名篇导读

于兴菊 种剑德 王菊 邢鹏飞 ○ 编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诗词曲名篇导读/于兴菊,种剑德,王菊编著.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0.6
ISBN 978-7-5316-5560-2

I. 中… II. ①于…②种…③王… III. ①古典诗
歌—文学欣赏—中国—师范大学—教学参考资料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23199 号

中国古代诗词曲名篇导读

Zhongguo Gudai Shiciqu Mingpian Daodu

于兴菊 种剑德 王 菊 邢鹏飞 编著

责任编辑 徐永进 华 汉
封面设计 杜巍巍
责任校对 徐秀杰
出版发行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 158 号)
印 刷 哈尔滨太平洋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625
字 数 370 千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16-5560-2 定 价 36.80 元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网址:www.hljep.com.cn

如需订购图书,请与我社发行中心联系。联系电话:0451-82529593 82534665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451-82529347

如发现盗版图书,请向我社举报。举报电话:0451-82560814



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略论

(代序)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仅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有三千多年。在文字诞生之前,伴随着人类的生产生活,诗歌就迈开了它发展的脚步。漫长的历史、多变的时代,使得每个不同历史时期的诗歌都呈现出那个时代特有的风貌特征。它的每一步发展都展示着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标志着人们审美观念的变化,是时代变迁、文学发展的重要标识,是我们的先祖对自然、对人生、对社会的感悟和理解所凝结的精华。因为他们的存在,我们认识了民族发展的历史,了解了古人的思想并从中找到情感的共鸣,才有了对中华民族苦难历史的冷峻思考,才有了苦中作乐的浪漫情怀,才有了超越现实、期待美好未来的情感源泉。今天我们回顾诗歌的发展历程,目的就是触摸那一个个离我们远去的历史脉搏,从浩如烟海的诗歌长河中,拾缀其一二,展示于青年读者面前,使我们的灵魂得到些许的滋养。

(一)我国古代诗歌的发展脉络

诗歌的诞生最早可以上溯到文字产生之前,那时就已经出现了口头吟诵传唱的歌谣,这些歌谣是我国诗歌的源头。原始诗歌的产生不论是劳动说还是宗教说,其实都是源于一个原因,就是实用性。一是生产生活的需要催生了诗歌这一艺术元素的诞生,原始诗歌大都四言一拍子,结构短小简练,应该与此相关;诗歌的



另一个来源应当是当时的巫觋祭祀活动。伴随着巫神的歌舞表演,其中的祝祷歌词也成为原始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当时的文字没有流传下来,但从《诗经》中“颂”的成熟的歌唱形式及屈原《九歌》中所保留的楚地民间祭祀歌曲的内容和样式上,可以推想,原始歌谣中出于巫神祭祀活动而演唱的诗歌也为数不少,巫觋祭祀歌舞的需要应该也是诗歌产生的一个动因。

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保存完整的诗歌来源于《诗经》。《诗经》原名《诗》或《诗三百》,编纂于周代。它的来源和成分虽然比较复杂,但仍是沿袭原始诗歌的发展道路传承而来。《诗经》中的“风”是采自于各诸侯国和王室宗臣封地的民间歌谣,是劳动者“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何休《公羊传解诂》)的产物,说明诗歌是人们反映生活状态、抒发个人情感的重要手段之一;“雅”是诸侯朝会和贵族宴飨时演奏歌唱的乐歌,用于歌咏娱乐、烘托气氛,说明诗歌已经从抒发个人情感、沟通神明的作用之外开始娱悦人类自己,说明了诗歌功能的开拓与发展,这为后来词和曲的诞生、发展开辟了道路;“颂”是宗庙祭祀的乐歌,它的存在表明了祭祀乐歌的存在和发展,是诗歌功利性、实用性目的的重要体现。《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创造性地使用了“赋”、“比”、“兴”的艺术手法,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艺术支持和美学范本。

《诗经》编撰流传三百年之后的战国中期,南方的楚国诞生了一位伟大诗人——屈原,时代的动荡巨变激发了他的爱国情怀,楚地独特的民俗风物赋予他独特的浪漫气质,使他创作出了一系列骇世惊俗的伟大作品,他创作的骚体辞赋形式得到了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的响应,演变为“楚辞”这种独特的诗体,成为与《诗经》并驾齐驱的伟大作品。《楚辞》中列于屈原名下的作品共有二十五篇。其中《离骚》、《九章》、《九歌》、《天问》等是其代表作。“楚辞”多使用赋法铺排,想象自由驰骋,多引用神话传



说,意象瑰丽多彩,辞采丰富绚烂,成为我国浪漫主义诗歌的主要源头。

其后秦汉时设立的音乐机构——乐府,在诗歌的传承、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汉武帝为了“定郊祀之礼”,扩大乐府的职能,派人到各地采集民歌俗曲,以“观风俗,知薄厚云”(《汉书·艺文志》)。这部分诗歌被人称为“乐府诗”。乐府诗的出现代表了诗歌发展的新阶段。乐府诗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出现了不同的变体,成为我国诗歌中生命力极强的乐章。现存汉乐府主要是东汉乐府采摭并演唱的歌曲。如《陌上桑》、《十五从军征》、《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等,汉乐府多为篇幅短小的叙事诗,往往截取一个典型的生活画面,反映激烈的矛盾冲突或情感变化,形象鲜明,风格各异,是叙事诗的重要发展阶段。

东汉以后出现了文人模仿乐府五言歌行而创作的五言诗,其中大多收集在《古诗十九首》中。内容多叙离别、相思以及对人生短促的感触。长于抒情,善用比兴,是文人五言诗成熟的重要标志。乐府诗的长足发展是颇为动荡的东汉末年,建安初年以曹操为代表的“邺下文人集团”,创作了许多慷慨激昂、“梗概多气”的乐府诗,形成了为后世称道的“建安风骨”,其中代表作有曹操的《短歌行》、《蒿里行》,曹植的《白马篇》和《赠白马王彪》、王粲的《七哀诗》等,建安诗歌是汉乐府向文人五言诗发展转变的关键。魏末正始时期政治斗争激烈,诗人有较强的危机感和幻灭感。诗歌多抒写个人忧愤,代表人物是“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和嵇康,他们的诗是“建安风骨”传统的延续。两晋时期,文人不敢直面黑暗动荡的现实政治,诗歌创作上形式主义泛滥,如“太康体”、“游仙诗”、“玄言诗”等都相继登场,内容上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但在题材、形式上的探索,为我国诗歌题材的扩大和发展做了有益的探索。其中脱胎于玄言诗的山水诗就在其中酝酿诞生。此时唯一能够继承和发扬“建安风骨”传统、作品内容充实的诗



人,是以“左思风力”而著称的左思。东晋末年,陶渊明的出现才使诗坛诗风为之一振。他迫于生计入仕为官,后又辞官归隐,他以超脱流俗、“不为五斗米折腰”(《晋书·陶潜传》)的傲世精神和回归自然的独立不羁的个性为诗歌的基本格调,以田园生活、农村风光为载体,写下了如《归园田居》、《饮酒》等大量的优秀诗篇,成为山水田园诗的开创者,为古典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稍后的另一位大诗人谢灵运热衷山水,成为开创山水诗派的第一人。南齐永明年间,“声律说”盛行,逐渐形成了新诗体——“永明体”。这种新诗体是格律诗的开端。代表诗人是谢朓,他的山水诗清新流丽,自然华美,诗风臻于成熟,对唐代近体诗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谢朓与谢灵运并称为“大小谢”。另有擅长七言诗的鲍照和集南北朝文学之大成的庾信。南北朝时期还是乐府民歌的繁荣期,南北朝乐府篇幅短小,抒情多于叙事。南朝乐府几乎都是情歌,一般为五言四句小诗,风格清新柔婉,保存下来的有四百八十多首;北朝乐府数量虽少,但内容丰富,体裁多样,语言质朴,风格刚健。其中最著名的长篇叙事诗《木兰诗》与《孔雀东南飞》并称为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双璧”。南北朝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发挥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是诗歌发展的重要转折期,这个时期诗歌体式和风格的多样化,预示着一个新的诗歌繁荣期的到来。

诗歌发展到隋唐五代,出现了高度繁荣的局面。隋代虽然立朝时间短暂,但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为诗歌的发展提供了思考、整合、过渡的空间和时间,并终于迎来了唐代诗歌的黄金时代。唐诗流派林立,诗人众多,大家辈出,各体皆备,既继承发展了古体诗,又完善了近体诗,风格上异彩纷呈,创作盛况空前。据《全唐诗》记录,有诗人二千二百余人,留下作品近五万首。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约五六十个。尤其是近体诗的创造和成熟,把我国古典诗歌的音节和谐、文字精练的艺术特色,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



度,成为古典诗歌最典型的形式。

唐诗的发展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初唐最为活跃的是宫廷诗人。上官仪是其中的佼佼者,其诗歌风格被称为“上官体”。对唐诗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是以“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为代表的宫廷外中下层文人,他们拓展了诗歌的思想题材领域,五言八句的律诗形式也由他们开始初步定型。武后时期的陈子昂写下了《感遇诗》三十八首,是他鲜明的革新精神的代表。此外,王绩的田园隐逸诗开启了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先声。沈佺期、宋之问在前人的基础上,最终完成了律诗定型的工作。张若虚亦是这一时期的著名作家。

盛唐诗坛万紫千红、百花争艳。这一时期诗人的作品反映广泛的社会生活,声律风骨兼备,境界雄阔、含蕴深厚、韵味无穷,洋溢着所谓的“盛唐气象”。乐府、歌行、律诗、绝句,各体齐备;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各领风骚;边塞诗派、山水田园诗派,各呈异彩。盛唐诗人的杰出代表是李白和杜甫。李白的诗现存九百八十多首。他的诗主观色彩浓烈,激情澎湃,想象奇伟多姿,意象波澜壮阔,气势豪放飘逸,体式多样,但贡献最大的是七古和七绝。其鲜明的独创性扩大了浪漫主义的表现领域,丰富了浪漫主义的手法,有“诗仙”的美称。杜甫是我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以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和力度,记录了唐代由盛转衰的社会全貌,因而被称为“诗史”。体式上集前人之大成,各体皆工,律诗尤为突出;风格上以浑融的艺术境界、出神入化的表现技巧、沉郁感人的思想情操和人格力量著称于世,形成了“沉郁顿挫”的风格,在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发展过程中有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盛唐诗坛的其他诗人主要有山水田园诗人和边塞诗人两大群体。孟浩然、王维、常建、储光羲等是山水田园诗人的杰出代表。孟浩然代表作为《过故人庄》。王维诗、书、乐、画兼擅,艺术造诣精湛,“诗中有画”(苏轼《东坡题跋》)是其山水田园诗的



主要特点,代表作如《新晴野望》、《渭川田家》等。在边塞诗人中,王昌龄七绝用力最专,成就最高,后代称之为“七绝圣手”,他的《从军行》、《出塞》历来被推为边塞诗的名作。李颀的边塞诗数量不多,成就却很突出。王之涣的诗仅存三首却俱是佳篇。高适的边塞诗与岑参齐名,世称“岑高”,岑参诗作以反映边塞生活著称,代表作有《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高适的诗风与岑参相近,也是一个大器晚成的诗人,有《燕歌行》等。

中唐前期代表人物有刘长卿、韦应物、戴叔伦等大历十才子,他们的作品回避现实、气骨衰弱。“诗到元和体变新。”(白居易《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贞元元和年间,诗人们在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努力求新求变,开拓出诗歌的新境界。其中白居易和元稹以及张籍、王建等人弘扬古乐府精神和杜甫的写实传统,掀起了一个现实主义诗歌的高潮——“新乐府运动”。其中白居易用通俗浅易的风格写下了大量的揭露现实和批评时政的讽喻诗,同时他的长篇歌行体如《琵琶行》、《长恨歌》等,委婉曲折、描写细致,对叙事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另一派诗人就是韩愈、孟郊、李贺等人,他们自成一家,史称“韩孟诗派”。

晚唐是诗的衰微期。杜牧为晚唐七绝圣手,笔力劲拔,俊爽峭健,《山行》、《泊秦淮》等是他的代表作;李商隐以爱情诗见长,诗风凄艳浑融,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夜雨寄北》、《无题》等极见功力;贾岛、姚合以苦吟的创作态度精雕细琢,作品工整精警;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等以社会现实为题材,反映晚唐的社会矛盾和民生疾苦,是新乐府运动的余绪。

晚唐五代兴起了一种合乐而歌的新诗体——词。词最早是配合隋唐时期诞生的乐曲新声——宴乐而写的歌词。词体在民间兴起后,盛唐和中唐一些诗人开始了对这一新形式的尝试。传说大诗人李白写过《菩萨蛮》、《忆秦娥》两首,但文人真正认真地倚声填词是从中唐开始的。有作品传世的作家有张志和、刘禹



锡、白居易等。五代时,后蜀赵崇祚选编十八家词人的词五百首为《花间集》,这是文学史上第一部文人词选集。他们的词风大体一致,后世因称他们为“花间词人”和“花间派”。花间派尊温庭筠为鼻祖,温庭筠与李商隐并称“温李”,是文学史上第一个专力写词的作家,善作“恻艳之词”,奠定了“婉约词”的基调,今存词七十余首。韦庄的词现存五十余首,与温庭筠并称“温韦”,韦庄的词与温词分别代表了《花间集》的两种不同风格。以中主李璟、后主李煜、宰相冯延巳为代表的南唐词,时代稍晚于西蜀词,虽也表现出情致缠绵的特点,但词的内容和意境多有拓展。冯延巳是唐五代作词最多的一位词人,词风清丽淡雅、擅长白描;中主李璟词仅存四首,《浣溪纱》其二最负盛名。后主李煜多才多艺,诗文俱工,书画兼擅,词的成就尤高,《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浪淘沙》(窗外雨潺潺)是其中最脍炙人口的作品,其词开文人抒情词的先河。从中晚唐开始,我国古典诗歌中的两种主要形式——诗和词,就沿着两条道路曲折地向前发展一直到明清两代。

宋代是继唐之后又一个文学创作的繁荣期。诗发展到宋代已不似唐代那般辉煌灿烂,但仍然在曲折中发展。它延续唐诗的发展道路,同时又呈现宋代独有的特点,形成了备受后人争议的迥异于唐诗的“宋调”。宋初诗坛是中晚唐诗风的延续,主要有“香山体”、“西昆体”、“晚唐体”三大派。北宋中期以欧阳修为领袖的诗文革新运动奠定了迥异于唐诗的宋调。其中,代表诗人欧阳修的诗题材广泛,已表现出比较明显的散文化、议论化的倾向,体现出宋诗重“意”的特点。其后,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相继主持诗坛,以其鲜明的个性独领风骚。使宋诗的发展出现了鼎盛的局面。王安石后期诗风大变,多写山水自然,形式上以绝句为主,讲究炼字、对仗,意境优美含蓄,形成了独特的“半山体”;黄庭坚被认为是与苏轼并驾齐驱的诗人,诗风奇特拗崛,多用典故,



务新求奇,自创一格,在他的影响下产生了声势浩大的江西诗派。苏轼的诗题材极为广泛,最能代表他的成就是写景抒怀诗。苏轼能从极平常的日常生活现象中发掘出深刻的道理,又能通过新鲜的比喻形象地表现出来,生动异常,富有美感。代表作如《和子由澠池怀旧》、《题西林壁》、《饮湖上初晴后雨》等。

从北宋过渡到南宋,出现了一批以陈与义、曾几为代表的“南渡诗人”。南宋初中期的诗歌以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中兴四大家”为主。范成大以“田园杂兴”诗闻名,写作了《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成为中国古代田园诗的集大成者。陆游一生写了大量诗歌,是南宋成就最高的诗人,也是著名的爱国主义诗人。其诗风接近李白,往往借助于梦境的描写来表达恢复中原的愿望,构成了陆游诗豪放浪漫的风格,有“小李白”之称。南宋中期以后出现了“永嘉四灵”及“江湖诗派”,南宋末年,随着抗元形势的日益恶化,出现了一批爱国诗人,如文天祥、汪元量、林景熙等。其中文天祥是南宋最后一位大诗人,作品中充满了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过零丁洋》是他的代表作。

诗歌的变体——词,自中唐出现以后,终于在宋代找到了适合它生长的沃土,成就了宋词的辉煌,成为代表着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一代之文学”(王国维语)。北宋初中期的词沿袭了唐五代词的特点,在形式上以小令为主,内容多写男女爱情、离愁别恨,艺术上多用白描手法。宋初的词人如张先、晏殊、欧阳修、晏几道等都有出色的作品,但依然没有脱离花间派的影响。词至柳永而一变,他是宋代第一位专力写词的人,“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柳永的词雅、俗兼备,尤其是将市民阶层的艺术趣味引入词作,大量创制和使用长调慢词,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代表作如《雨霖铃》(寒蝉凄切)、《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等。词至苏轼又一变,苏轼以诗为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胡寅《酒边词序》),使词



成为真正独立的抒情诗体,同时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以抒情词、咏物词和田园词成就最高。苏轼的最大贡献在于改变了婉约词一统天下的格局,开创了豪放词派,代表作如《念奴娇》(大江东去)等。北宋后期的词人中秦观、黄庭坚、贺铸和周邦彦等都是非常出色的词人。秦观代表作有《浣溪沙》、《鹊桥仙》等,被视为婉约词的正宗,贺铸的词兼有豪放与婉约等多种风格,其代表作如《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等。周邦彦词曲皆工,声律严整,章法缜密圆熟,语言典丽精工,代表作有《满庭芳》、《兰陵王》等,被推为北宋词的“集大成者”。

南宋初年词风骤变。李清照词变闺中闲吟为国破家亡的悲泣,史称“易安体”;辛弃疾及辛派词人继承了苏轼的传统,以表现爱国的豪放之情为主,辛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能于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形成了独特的“稼轩体”,将豪放词发展到高峰,与苏轼并称为“苏辛”。代表作如《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等。李纲、岳飞为代表的爱国将领以词呼吁抗敌救国,声情激越。受辛词影响,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等人形成了南宋中叶以后声势最大的爱国词派。南宋后期的词人姜夔、吴文英等则承袭了周邦彦的衣钵,在词的格律、辞藻等方面下工夫,从另一个方向发展了宋词。

元代散曲流行,诗词乃退居其后。散曲突破了传统的诗歌审美意识的窠臼,表现手法大多用铺陈白描,形式自由灵活,语言通俗流利,风格泼辣明快,显示出强大的艺术活力。在体式上分为小令和套数两种。元散曲作家有姓名可考的有二百多人,前期元曲作家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北方的大都,最有成就的是关汉卿、马致远、白朴、张养浩等人。他们的作品真率爽朗,风格浑朴自然,带有浓厚的市井生活气息,最能体现散曲通俗化、口语化的当行本色。其中马致远的散曲成就居全元之冠,号为“曲状元”。他



的散曲疏宕宏放,语言清新俊丽,显示出散曲语言由俗转雅的趋向,小令[天净沙]《秋思》、套数[双调·夜行船]《秋思》是其代表作。关汉卿文笔淋漓酣畅,并融入诙谐之趣,代表作是[南吕·一枝花]《不伏老》等。白朴的散曲风格较为朴实俊秀,文字清丽婉约,具有较为浓郁的诗意。张养浩是元散曲豪放派的大家,小令[中吕·山坡羊]《潼关怀古》是其代表作。

后期元曲创作中心转移到了南方的临安,此时出现了许多专写散曲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大多含蓄凝练,风格清雅典丽,格律谨严,辞藻雕琢,体现了散曲由通俗化向文人化发展的趋势。其中张可久、乔吉都是元散曲清丽派的杰出代表。睢景臣则注意发挥套曲能容纳广阔生活题材的长处,为散曲开拓了题材范围,曲文淳朴本色,保持着早期散曲的语言特点,代表作是[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相对散曲创作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而言,有元一代正統的诗词创作要逊色许多。作家不多,艺术上也缺少个性和感染力。稍有成就的是刘因、赵孟頫、萨都剌和王冕等人。

明、清的诗词创作中,作家和作品的数量都超过了前代,但不论是题材还是手法上都很难再超越前人。明代诗人多学习唐诗,亦步亦趋,多得其貌而神异。由元入明的诗人高启、刘基、袁凯等,诗作反映元末动乱,格调凝重悲怆。刘基的诗古朴雄放,古体诗成就较高;高启的诗兼采众长,才华卓犖,诗风豪健,是明代有成就的诗人之一。之后明初诗坛百余年笼罩着以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雍容典雅、粉饰太平、平庸乏味的“台阁体”诗风。明中叶以后,以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前、后七子发起拟古运动,提出“诗必盛唐”的主张。但他们的诗作大多停留在形式技巧的摹拟上,内容苍白空虚,缺乏真切的生活感受。明中叶以沈周、唐寅、文征明、祝允明为代表的江浙诗人蔑视礼法和传统,在诗作中大胆表现自由解放的个性,带有明显的城市市民的世俗生活和思想情趣,为诗坛吹来一股清丽之风;明后期以



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为代表的“公安派”，强调诗歌表现作者的真情实感和个性，提倡浅显通俗。明末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不少诗人投身于反抗侵略的现实斗争中，并以此为内容创作了许多感情慷慨激昂、真挚深切的诗歌。这些爱国诗人有陈子龙、夏完淳、瞿式耜等，为明末诗坛奏出了一出激越悲壮的尾声。值得一提的是明代民歌创作的繁荣，有人曾誉之为明代文学的“一绝”，现存作品一千余首。明代民歌表现了市民阶层对个性解放的追求，想象丰富，构思奇特，注意生活细节和心理活动的描写，手法多样，语言率直自然，一扫明代诗歌沉滞复古之气，给明代文学的发展带来一股清新气息。

明代词的创作虽处于低潮，但也时有佳作出现，如高启的《念奴娇》（自述）、杨慎的《临江仙》、陈子龙的《点绛唇》（春日风雨有感）等。散曲在明代又有了较大的发展，作家人数众多，创作数量可观。从题材开掘到艺术风格，都出现了一些新特点。

清初，诗歌创作进入比较活跃的时期，这个时期的诗人诗作都很多，数量、成就都超过明代。由明入清的爱国诗人顾炎武、王夫之、屈大均等，在诗中反映了国家民族兴亡大事，寄托自己的故国之思，内容丰富，风格沉雄。钱谦益是清代首开宗宋之风的诗人，在诗坛上居于盟主地位。吴伟业诗宗唐，富于情韵。诗坛上影响最大的是王士禛，王士禛论诗以神韵为宗，擅长七言绝句。清代中叶，诗坛上拟古主义诗风卷土重来。能抵御这场复古之风的著名诗人有郑燮、袁枚等人。清代晚期，道光、咸丰年间，诗人们冲破诗坛的沉闷局面，在作品中抒写忧国伤时的情怀，龚自珍是其中的佼佼者。同治、光绪年间，随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形成，发生了“诗界革命”。这一诗歌改良运动中的创作成就以黄遵宪最为杰出。其他如康有为、谭嗣同等人也有不少优秀作品，推动了“诗界革命”。清末，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逐渐走向高潮，资产阶级革命者秋瑾是这一时期的优秀诗人。随着五四运



动的到来,现代新诗的诞生,古典诗歌随着漫长而风云变化的旧时代悄然退出了历史舞台。

清词的创作也颇为兴盛。清初成就较高的词人有陈维崧、朱彝尊和纳兰性德等人。陈维崧的词效法苏、辛,气魄豪健,其中抒写身世和怀古吊今的作品尤为出色,他作词计一千六百余首,创作之富居历代词人之首。朱彝尊是浙派词家的代表,他的词在字句声律上推敲甚精,内容却比较单薄。纳兰性德以具有南唐词风著称,他的词多抒写离别相思之情,自然流丽,情致缠绵,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嘉庆年间,张惠言开创常州词派,主张词以比兴为重,崇尚含蓄婉约。清代散曲作家也很多,但作品缺乏新鲜内容,没有太大的成就。

(二)诗歌发展过程中呈现的共性特征

1. 立足现实、关注人生的创作态度与丰富多样的表现手法相得益彰,成就了诗歌的辉煌。

我国诗歌从诞生之初就奠定了立足现实、关注人生的积极创作态度。从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到两汉乐府、建安诗歌、山水田园诗,再到唐代以李杜为代表的各体诗歌,一直到宋词、元曲,诗歌在内容上始终没有偏离反映现实生活、讴歌人间真情的创作道路。诗人们立足于现实、反映生活的积极创作态度,使得各体诗歌紧扣时代脉搏,内容充实而丰富,这些宝贵的优良传统成为古代诗歌发展进步的坚实基础;同时从《诗经》的“赋、比、兴”开始,我国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法就呈现出多样化全面发展的局面,“赋、比、兴”不仅是艺术表现手法,更是诗歌表现手法的发展趋势和方向。其中“赋”法尚“实”,一般不采用议论和抒情的表达方式,也不借助或触及本事以外的其他事物作类比或推想,而是使用叙述描写的表达方式直接铺陈描摹作者所要表现的对象——客观的人、事和物象,将作品的主题和作者的情感隐藏于



诗歌所描述的“本事”(即诗歌描述的对象)上,由于“赋”在真切生动的铺叙之中包含着深刻丰富的主题和诗人的丰富情感,赋中有情,赋中有景,构成了含蓄深邃的美学境界,所谓的“序物以言情……情尽物也”(宋人李仲蒙)即是此意。但多数情况下“赋”多与“比”、“兴”等其他表现手法结合使用。与“赋”相比,“比”、“兴”尚“虚”,一般不直言本事(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感或观点),往往借助于联想、想象等手法描述“本事”以外的其他事或物来表现主题、抒发情感,是借助语言技巧和修辞手段来表现诗歌思想内容的一种方法。是将抽象事理形象化,将内在情感外物化,赋予主观情感以客观形象的审美形态,以此创造出诗歌的丰富婉曲的优美意境。其中“比”就是比喻,是“以彼物比此物”(朱熹《诗集传》),如明喻、暗喻、借喻、博喻等,“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朱熹《诗集传》)。“兴”则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朱熹《诗集传》)。“兴”在结构上用于开头或过渡,以引起下文、调节韵律、唤起情绪,而且多数情况下所借事物与诗歌揭示的主题有着委婉隐约的内在联系,有的则兼具比喻、象征、烘托等多种作用和意义,构成诗歌艺术境界不可缺少的部分,成为浪漫主义表现手法的基础。“赋”、“比”、“兴”手法在诗歌创作中往往交互使用,极大丰富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成为《诗经》之后各体诗歌的最基本的表现手法。稍后出现的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其揭露楚国黑暗政治之深刻,反映自己爱国情怀之强烈,远远超出了《诗经》诸篇反映现实的深度,是对现实主义题材的进一步开拓。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则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采用幻想、想象、象征、夸张、比喻等多种手法,极大丰富了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其后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主流诗歌大多秉持这些优良传统,在题材上始终跟随时代发展的脚步,关注现实,关注人生,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同时在外在表现手法上,进一步发展了《诗经》《楚辞》所创造的各种艺术手法,既有运